

# 德國司法社會服務概觀

林順昌

## 壹、前言

德國司法領域引進社會工作殆可追溯自1953年的緩刑交付感化試驗制度（Strafaußsetzung zur Bewährung），同年10月「感化試驗官協會」（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Bewährungshelferinnen und Bewährungshelfer, ADBeV）豎起該領域的專業牌樓。1955年5月，各邦感化試驗官的設置規定開始生效；1958年科隆成立「感化試驗官聯合會」（Förderverein der Bewährungshilfe Köln e.V.），以支援感化試驗相關工作及資訊交流為宗旨，半世紀以來，深深影響德國犯罪者非機構處遇政策的走向。如今，感化試驗官以公務員或受聘專家之身分行使司法權義，通常為社會工作或社會教育學位背景，負責執行緩刑或假釋中的感化試驗，也被指定為行為監管之執行者。現今德國司法社會工作面臨著複雜而多變的挑戰，許多學者

紛紛倡導摒棄傳統，改從科學角度看待刑事政策的改變，而且社會工作、刑法暨刑事政策協會（DBH）及感化試驗官協會（ADBeV）的網站均以「司法社會服務」（Soziale Dienste der Justiz）為標題，頗有轉型之勢。

我國近年司法改革議題殷切，犯罪者非機構處遇政策亦在2017年之國是會議決議擬設專法，基於刑事法制向來沿襲歐陸法系國家，尤其仿效德國甚篤之故。自然不宜獨漏德國之借鑒。緣此，為文概述其犯罪者非機構處遇現行制度，俾提供當局及有識者參考。

## 貳、朝向社會服務轉折的非機構處遇

德國從1923年開始對少年犯試用緩刑制度，二戰結束後，波恩（Bonn）法院法官（Jugendrichters）路德維希·克洛斯

特曼（Ludwig Clostermann）及斯圖加特（Stuttgart）的檢察官（Staatsanwalt）阿爾方斯·瓦爾（Alfons Wahl），陸續為被告指定了「感化試驗官」（Bewährungshelfers），並由聯邦預算提供經費（北萊茵西發利亞邦司法網）。

迭至1975年，隨著《刑法》的修正及再社會化的重視，早期受人詬病的「警察監督」（Polizeiaufsicht）被改以「行為監管」（Führungsaufsicht）取代。此後，假釋人除了交付感化試驗，尚須接受行為監管，遇有特殊情況或重大治安考量，法官並可就個案附加必要命令及負擔。

2000年，黑森邦（Hesse）引進行蹤定位措施，授權法院得以司法解釋附加電子監視命令（Markus Mayer, 2002: 1），並自5月開始試辦電子監視方案。其對象共有5種<sup>1</sup>。依刑法第56c條緩刑或第56f條緩刑中違規而暫緩撤銷者、2. 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附加命令而停止羈押者、3. 黑森邦恩赦法第19條附加負擔及必要命令者、4. 依刑法第57f條假釋者、5. 依刑法第68f條裁定行為監管者。2007年，北萊茵西發利亞邦（Nordrhein-Westfalen）通過《行為監管及追溯性預防拘留修正法案》（Gesetz zur Reform der Führungsaufsicht und zur Änderung der Vorschriften über die nachträgliche Sicherungsverwahrung），增訂許多創新措施。2009年，巴登符騰堡邦（Baden Württemberg）亦通過《刑罰執行

電子監管法》（Gesetz über elektronische Aufsicht im Vollzug der Freiheitsstrafe, EAStVollzG），成為德國電子監視法制化的先驅。2010年，北萊茵西發利亞邦擴大對性侵害、綁架虐童、殺人等嚴重暴力犯罪者限制住居及行蹤定位（北萊茵西發利亞邦司法網）。然而電子監視經德國聯邦憲法法庭判定違憲（聯邦憲法法院網），聯邦進而在2011年增修《刑法》（Strafgesetzbuch, StGB），擴增附加命令的內容。

至此，德國非機構處遇政策已朝多元化轉變，惟迄無專法而散見於刑法、少年法院法、刑事訴訟法、麻醉藥品管制法，採取「刑罰」（Strafe）及「保安處分」（Sicherheitsaktion）雙軌模式。其中「非機構處遇」主要為「改善與保安措施」（Maßregeln der Besserung und Sicherung），以「感化試驗」（Bewährung）、「行為監管」（Führungsaufsicht）、「負擔」（Auflagen）及「必要命令」（Weisungen）為核心，皆屬「司法處分」。條文除賦予法定位階之外，同時設定要件、期間及中止機制，強調法定權義、改變條件及違反後果。此與海洋法系將社區矯正視為行政行為，並淡化刑罰本質之特色迥異。

弔詭的是，ADBeV曾在2003年對全國具有代表性的法官進行有關「感化試驗民營化」的問卷調查。雖然有93%的法官反對（ADBeV網），但「社會工作

專業協會」(Deutscher Berufsverband für Soziale Arbeit e.V., DBSH)依舊聲稱：「多數感化試驗官反對採用『社工式司法』(Sozialdienstes Justiz)一詞，包括感化試驗、行為監管、司法協助及監獄中的社會工作，均應改稱「社會服務」(Sozialen Diensten)」(DBSH網)。

學者Hans等人更強調：現代刑罰必須關注受刑人的社會技巧訓練、心理諮商、就業培訓及出獄準備(Hans-Dieter, Alexander, Jörg-Martin & Klaus, 2019: 180-82, 592-94)。Wolfgang等人認為：對於刑事犯罪單純以控制著手是不可想像的(Wolfgang, Heidi, 2012: 23)。Farrall等人亦指出：對於危險及社會混亂的感知與態度，是恐懼犯罪的主要成份；單純監測並不能使再犯風險降到最低，自我改變的動機，才是擺脫犯罪的主因。預防再犯必須在技術、方法及系統組織上提供科學化的過程，始能掌握犯罪動機及預防措施之間的關係(Farrall, Jackson, & Gray, 2009: 5, 8)。DBSH更據以強調司法權威無法保證與個案進行有效合作，徒增官僚主義的障礙，為擴展服務範圍及效率，應廢除行為監管機構，感化試驗應改為民營(Klimke, Sack, & Schlepper, 2013: 103; Michael, Evangelische & Rauhes, 2013: 1)。其年度會議除了呼籲改善社會環境、增進就業機會，也倡議減少案件負荷，建議每人每月合理負荷應在45名個案(Probanden)以

下，以降低風險。

揆其訴求，明顯傾向以「社會服務」(Sozialen Diensten)之角度看待「社區矯正」(Community Corrections; Gemeinschaft Korrektur)。這種轉型風氣儼已複製海洋法系的「非機構處遇」(Non-institutional Treatment)模式。柏林的「司法、消費者保護暨反歧視管理局」(Senatsverwaltung für Justiz, Verbraucherschutz und Antidiskriminierung)甚至以諮詢服務為業務主軸(柏林司法網)，除了協助衝突調解、法律諮詢，亦受理財務管理諮詢、債務協商、破產建議、成癮諮詢、精障疾病關懷、家庭扶助、受害者賠償、社會團體工作、被拘留者的司法協助、罰金處理建議、婦女綜合諮詢服務，業務完全導向為民服務的法律諮詢中心。但耐人尋味的是，德國司法系統與相關法規迄今維持傳統框架，似無仿效英美相關體制之意。黑森邦司法部(Hessisches Ministerium der Justiz)對於感化試驗的說明，還特別強調「感化試驗個案不是社會工作案主」(黑森邦司法網)。綜言之，德國非機構處遇制度正值轉型時期，司法系統因為導入社會工作而產生實務運作漂移，洵值關注。

## 參、訴訟程序中的司法社會服務

司法社會服務的措施散見於德國的刑事訴訟程序，茲臚列重點如下：

## 一、偵查階段

偵查階段的「轉向」主要為「中止訴訟」（Einstellung des Verfahrens; Absehen von der Verfolgung），亦即暫停進行偵查及公訴，但無法效上的確定力，檢察官得隨時續行偵查，法官也可事後變更而續行審判。根據聯邦統計局（Statistische Bundesamt; Destatis）近期公布（Statistische Bundesamt, 2019: 3），2018年約有156,800人於訴訟程序無罪釋放或中止訴訟。對應於「中止訴訟」之司法措施，依刑事訴訟法第153a條之規定，檢察官（Staatsanwaltschaft）得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在取得法院（Gerichts）及被告（Beschuldigten）的同意下，在「中止訴訟處分」附加（Erteilen）合適的「負擔」（Auflagen）及「必要命令」（Weisungen）。所謂「負擔」及「必要命令」，按照該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如下：

1. 提供一定之服務以彌補犯罪造成之損害。
2. 支付公益機構或國庫一定數額之金錢。
3. 履行公益之勞動服務。
4. 遵守支付一定金額之維護義務。
5. 致力被害賠償協議，努力達成全部或大部分內容以彌補犯行。
6. 參加社會化訓練課程。
7. 參加道路交通管理法第2b條第2項第2款指定之道路交通講習或第4a

條指定之安全駕駛相關課程。

至其履行期限，規定在同條項後段。其中第1、3、5、7款，期限最長6個月，而第2、4、6款，最長1年。檢察官亦得於事後「解除」原負擔或必要命令，亦得在期屆前展延履行期間1次（3個月）。或在被告同意下，追加或變更負擔及必要命令。而一旦被告完成履行，即不得再行起訴；若期屆仍未完成者，其已履行之部分不予返還。

「中止訴訟」在《麻醉藥品管制法》（BtMG）亦有類似設計，按第31a條第1項規定，觸犯第29條第1、2、4項規定之被告，如其罪行輕微，無追訴之公共利益，且其栽種、製造、進口、出口、運輸、購買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或持有麻醉藥品之目的，僅供自己消費者，檢察官得不起訴。如在主管機關許可之「藥物消費室」（Drogenkonsumraum）僅有少量麻醉藥品供自己使用，檢察官得依第10a條之規定，對於施用者不予起訴。檢察官如已起訴，按第2項之規定，法院亦得在第1項之條件下，經檢察官及被告同意中止訴訟。

此外，依麻醉藥品管制法第31條規定，法院對於被告自白促使司法機關發現他人觸犯該法第29至30a條所列之罪，或其自白幫助司法機關阻止他人實施第29條第3項、第29a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30a條第1項之犯罪計畫者，得依刑法第49條第1項規定，酌予減輕罪責；如其宣告

刑罰未達3年有期徒刑者，得免予執行。並且準用刑法第46b條第2項及第3項之規定，法院在審判時，應特別考慮被告協助調查或預防嚴重犯罪之自白事實、其類型、範圍、對調查的意義、阻止犯行及啟示的時機、執法機構及其所涉情事的嚴重性，以及前述情節與犯罪的嚴重程度及被告罪責的比例。隨之，第34條進一步規定，法院得對於觸犯第29條第3項、第29a、30、30a條之被告裁定行為監管。

「行為監管」是一種不剝奪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類似我國的保護管束，受行為監管者必須定期向感化試驗官或指定之監督機構報到，敘明其生活、就學或就業狀況，並接受輔導及監督。但是法院要對犯罪者宣告行為監管之前提，必須其所犯為法定得為監管之罪（基本上都是中度刑罰以上之罪），並以其有再犯之虞為限。德國為順利實施行為監管，在刑法第68a條規定：「受判決人應受監督機構之監督；法院得於其行為監管期間任命一名感化試驗官（第1項）。感化試驗官應與監督機構合作，協助並監管受判決人（第2項）。監督機構在法院之認可及感化試驗官之支援下，對受判決人之行為及履行命令之情況進行監管（第3項）。」故在第一線實施行為監管的是監督機構，而當個案違反第68b條之「必要命令」時，監督機構得向法院請求判處個案三年以下徒刑或罰金（刑法§145a）。

所謂「必要命令」有12款：1.未經監管機構許可，不得擅離住所、居所或特定場域。2.禁止接近提供再犯機會或相當刺激之特定場所。3.不得聯繫、交往、僱用、教育或容留被害人，或提供機會或鼓勵再犯之特定人及團體。4.不得從事可能促發犯罪之特定活動。5.不得持有、攜帶或保管可能促發犯罪或相當刺激之特定物品。6.在交通工具可能作為犯罪工具之情況下，不得擁有或使用特定車輛或其他交通工具。7.於指定時間向監管機構、特定機構或感化試驗官報到。8.居住或工作地異動，應通知監管機構。9.失業時應通知勞動局所屬機關或其他經勞動許可之職業介紹機構。10.有事實足認其使用酒精飲料或其他使人酣醉之相類物品，可能助長再犯者禁止使用，並接受非侵入性酒測或藥物檢測。11.於指定時間或特定間隔，向醫師、精神治療師或司法醫療機構就診。12.隨身攜帶電子監視行蹤之科技設備，且不得干擾其功能運作。

這些命令由監管機構負責執行，有關職務指派具有公務員身分或國家認可的社會工作者或社會教育者實施，負責人應具備擔任法官或公務員之資格。不過，法院亦得撤銷該命令而移交給檢察署執行；且任何人對於移轉，不得異議。

為建立以感化試驗官為中心的司法社會服務制度，第68a條又規定：「監督機構依第145a條但書聲請前，應聽取感化

試驗官之意見（第6項）。」「受判決人經依第68b條第2、3項裁定必要命令，司法醫療機構視同第2項規定人員，得對其提供協助及監管。第3至6項有關感化試驗官之規定，準用於司法醫療機構（第7項）。」工作人員之間秉持己身專業之餘，也要平衡犯罪預防的需求，調整職業倫理。質言之，行為監管旨在協助、關懷、管理及監督。在督促個案履行命令之餘，也透過生活諮詢及心理支持，幫助解決紛爭、居住困擾、就業媒合、克服成癮、處理債務等問題，並從中與相關單位協調合作。

## 二、審理階段

德國審判前並無「感化試驗」之交付，僅在例外時，因為法官附加之命令有追蹤查核其履行狀況之需要時，始依刑法第68a條或刑事訴訟法第463d條任命感化試驗官進行相關調查或司法協助。其中較重要的有中止訴訟、附隨訴訟及停止羈押之附加必要命令。三者雖都以促進「社會復歸」為目的，但其必要命令不盡相同，特別是停止羈押而附加命令，尚兼具「證據保全」及「社會防衛」的作用。

按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之規定，法官評估被告有逃亡之虞，但依輕微之限制措施仍可滿足羈押目的時，得指示以下命令並裁定免除羈押：1.「報到義務」（在特定時間向法院、執法機關、行為

監管機構或其指定之辦公處所報到）；2.「限制住居」（未經法官或執法機關許可，不得擅離居所或特定區域）。3.「在宅拘禁」（離開居所應受特定人員之監督）。4.「提供擔保」（由被告或他人提供足額之擔保）。同條第2項又規定：「法官評估案件有陷於調查困難之虞，但預期依輕微之限制措施仍可滿足羈押目的時，亦得下令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或專家聯繫，並裁定停止羈押。」同條第3項則規定：「法官如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遵循某些指示即可預防再犯，並達到羈押目的時，得停止執行依第112a條發出之羈押令。」簡言之，法官評估設定報到義務、限制住居、在宅拘禁、提供擔保、禁止聯繫特定之人等措施，即可滿足羈押之目的時，即可裁定停止羈押。

至於審判後之司法社會服務措施，主要為緩刑、保留刑罰之警告、假釋及行為監管，前三者有準用之規定而比較相似，其附加命令原則上需得被告同意，但行為監管則否（附加治療安置除外）。在感化試驗或行為監管之期間方面，前三者均設有交付感化試驗的規定，期間以保留刑罰之警告最短；但行為監管無交付感化試驗的規定，自身設有執行期間，可能定期或不定期。

在撤銷要件方面，保留刑罰之警告及假釋之撤銷，準用緩刑撤銷之規定，所以三者情形相同皆採「相對撤銷」主義，

表 1 審判前之司法社會服務類型

項目	中止訴訟	停止羈押
依據	刑訴 § 153	刑訴 § 116
基本要件	1. 輕微案件且經法官同意 2. 極輕微案件由檢察官職權裁量	證據保全
特殊要件	1. 附加命令須被告同意 2. ①③⑤⑦款履行期限為6個月，其他款為1年	預期輕微限制措施仍可滿足羈押目的
附加命令依據	刑訴 § 153a.I①-⑦	刑訴 § 116
附加命令內容	1. 損害賠償 2. 公益給付 3. 勞動服務 4. 維護義務 5. 修復義務 6. 受訓義務 7. 道交講習	1. 報到義務 2. 限制住居 3. 在宅拘禁 4. 提供擔保 5. 禁止聯繫特定人 6. 電子監視
主要目的	社會復歸	證據保全、社會防衛及社會復歸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表 2 審判後之司法社會服務類型

項目	緩刑	保留刑罰之警告	假釋	行為監管
依據	刑 § 56a	刑 § 59	刑 § 57、57a	刑 § 68
基本要件	宣告刑在一年以下	宣告刑在180天以下之罰金	1. 得審酌之假釋：服刑滿2個月且刑罰執行達3分之2 2. 應審酌之假釋：初次入獄，服刑滿6個月且刑罰執行達2分之1 3. 無期徒刑之假釋：服刑達15年，經整體社會安全權益衡量，認無特殊嚴重情狀	1. 宣告刑在6個月以上 2. 有再犯之虞 3. 觸犯刑法明定之罪（§ 129a.9、89a.6、181b、233b、239c、245、256、262、321）

項目	緩刑	保留刑罰之警告	假釋	行為監管
特殊要件	1. 徒刑9個月以上且未滿27歲者，應附加必要命令 2. 治療安置須被告同意	1. 戒癮治療須被告同意 2. 宣告保安處分，不得併宣告保留刑罰之警告	1. 受刑人同意 2. 法院得定2年以下之期限，不准無期徒刑受刑人聲請假釋	1. 治療安置須被告同意 2. 佩戴電子腳鐐不得誘發犯罪動機或因此刺激再犯 3. 電子監視應於2年內考慮取消 4. 電子監視對象限於限於： (1) 觸犯分則第1、7、20、28章或民族刑法或麻醉藥品法之罪名，且最輕本刑10年以上徒刑之罪，或第89a條第1至3項、第89c條第1至3項、第129a條第1項、第174至174c條、第176條、177條第2項第1款、177條第3項或第6項、第180、182、224條、第225條第1項或第2項、第323a條等罪，侵害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性自主。 (2) 該當第145a條之構成要件，並曾因a目或b目規定之事由而交付行為監管。 (3) 受宣告3年以上徒刑。
附加命令依據	刑 § 56b、56c、56d	刑 § 59a	刑 § 57. III、57a. III	刑 § 68b
附加命令內容	1. 損害賠償 2. 公益給付 3. 勞動服務 4. 守規義務 5. 報到義務	1. 損害賠償 2. 扶助義務 3. 公益給付 4. 戒癮治療 5. 受訓義務	與緩刑相同 (準用第56f條)	1. 限定居所 2. 禁止接近刺激物 3. 禁止聯繫特定人 4. 禁止特定活動 5. 禁止持有特定物



項目	緩刑	保留刑罰之警告	假釋	行為監管
	6. 遠離義務 7. 扶養義務 8. 戒癮安置	6. 道交講習		6. 禁用交通工具 7. 報到義務 8. 異動通知義務 9. 失業通知義務 10. 接受酒測或藥檢 11. 治療義務 12. 電子監視 13. 守規義務 14. 扶養義務 15. 戒癮安置
感化試驗或行為監管期間	2年以上、5年以下	1年以上、2年以下	1. 有期徒刑之假釋為2至5年，且不得少於殘刑期間 2. 無期徒刑之假釋為5年	1. 原則上2年以上、5年以下 2. 因陷入第20條或第21條之狀態，或違反第68b條第1項或第2項命令，而有再犯重大罪行致生危害公眾之虞，得裁定不定期行為監管 3. 不定期行為監管滿2年應評估是否停止
撤銷要件	1. 再犯 2. 嚴重或持續違反緩刑負擔或必要命令 3. 不服監督並有再犯之虞	準用第56f條（與緩刑之撤銷相同）	與緩刑相同（準用第56a～56e條）	無
原刑罰之終了	1. 感化試驗期滿 2. 裁定免除	1. 感化試驗期滿 2. 裁定免除	1. 感化試驗期滿 2. 裁定免除	無
刑事政策目的	1. 濟短期自由刑之弊 2. 社會復歸	1. 濟短期自由刑之弊 2. 社會復歸	1. 濟長期自由刑之弊 2. 社會復歸 3. 社會防衛	社會防衛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全數在法官保留原則下歸由法官依職權裁量；但行為監管是不利於犯罪者的保安措施，無撤銷之規定，而有中止規定。在刑事政策目的上，前三者側重於犯罪者的社會復歸，行為監管則側重於社會防衛，謹守監督及管制核心。

有關原刑罰之免除，緩刑按第56g條第1項之規定：「緩刑之感化試驗期滿而未經撤銷者，免除其刑……」故，緩刑之原宣告刑必須在期滿後始能免除，並由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53及454條規定逕行裁定。假釋之殘刑，依第57條第5項前段「準用第56g條」之規定，亦在感化試驗期滿後，經法官裁定免除始告終結（Walter Stree, 2014: 27）。在行為監管方面，其與刑罰本即同時並存，原刑罰不因監管結束而終結。

## 肆、德國司法社會服務實務概觀

「司法社會服務」（Soziale Dienste der Justiz）部門多數採取整合服務模式，集結行為監管、司法協助、感化試驗、被害補償、被害諮詢及證人支援等相關工作於一身，少數採取分離模式。以黑森邦為例（黑森邦司法部網站），感化試驗及行為監管業務設於法院，富爾達（Fulda）、達姆施塔特（Darmstadt）、法蘭克福（Frankfurt）、基森（Gießen）、哈瑙（Hanau）、卡塞

爾（Kassel）、林堡（Limburg）、馬爾堡（Marburg）、威斯巴登（Wiesbaden）等9個地方法院配置195名感化試驗官（每名平均負荷80.4件），常與法院、檢察署、監獄、警察局、社會福利局、青年福利局、監管機構、移民署，公益慈善機構，甚至是個案的律師、債權人、房東或親屬聯繫。至於「司法協助機構」則配屬在41個區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從事刑事訴訟法第160條輔助調查事項及支援事務。富爾達地區的部門即分成「富爾達司法社會服務處」（Landgericht Fulda Bewährungs- und Gerichtshilfe Dienststelle Fulda）及「巴特黑斯費爾德司法社會服務處」（Landgericht Fulda Bewährungs- und Gerichtshilfe Dienststelle Bad Hersfeld），兩個轄區底下再分「地方法院感化試驗工作室」（Bewährungshilfe bei dem Landgericht Fulda）及「檢察官辦公室司法協助中心」（Gerichtshilfe bei der Staatsanwaltschaft Fulda）。

另一種分離模式是將少年犯（Jugendliche，犯罪時年滿14未滿18）及甫成犯（Heranwachsende，犯罪時年滿18未滿21）特別抽出，成年部分自設業管部門。有關成員組織，視業務歸屬而隸屬法院或檢察機關，極少數隸屬行政部門。以勃蘭登堡邦為例，係將司法社會服務系統劃歸司法部管轄。但因憲法保障司法獨立，司法部不能審查司法裁決

表 3 德國司法社會服務組織簡表

邦名	專業領域	組織（機構或單位）	隸屬機關
巴登符騰堡	統整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司法協助暨犯罪被害補償辦事處	巴登符騰堡邦立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局
巴伐利亞	分離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辦公室	地檢署
柏林	成年統整式社會服務	特殊社會服務機關：成年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服務處	司法、消費者保護暨反歧視管理局
柏林	青少年社會服務	青少年感化試驗服務處	教育、青少年暨家庭管理局
勃蘭登堡	統整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司法協助暨犯罪被害補償工作者聯合辦事處	邦高等法院
不來梅	統整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行為監管暨司法協助工作者聯合辦事處	司法暨憲政獨立管理局
漢堡	成年統整式社會服務	成年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獨立機構	艾姆斯布特爾刑罰暨司法協助管理局專家辦事處
漢堡	青少年社會服務	青少年感化試驗辦公室	艾姆斯布特爾刑罰暨司法協助管理局專家辦事處
黑森	分離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服務處	地方法院（或法院檢察官辦公室）
梅克倫堡－西波莫尼亞	統整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工作者聯合辦公室	邦政府刑事門診管理局
下薩克森	統整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辦事	奧爾登堡上級地方法院
北萊茵－西發利亞	統整式社會服務	司法協助及感化試驗辦公室	地方法院
萊茵蘭－普法爾茨	分離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辦公	地檢署
薩爾	統整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工作者聯合辦公室	地方法院
薩克森	統整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工作者聯合辦公室	地方法院
薩克森－安哈特	統整式社會服務	行為監管、司法協助、感化試驗、被害補償、被害諮詢及證人支援工作者聯合辦事處	薩克森－安哈特司法平等部

邦名	專業領域	組織（機構或單位）	隸屬機關
石勒蘇益－荷斯泰因	分離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辦公室	地檢署
圖林根	統整式社會服務	感化試驗暨司法協助工作者聯合辦事處	邦高等法院

資料來源：德國感化試驗官協會（ADBeV）<https://www.bewachrungshilfe.de>。

表 4 近年各邦感化試驗及行為監管案量

邦名	項目年度	2010	2015	2017	2018	2019
巴伐利亞	小計	33,330	31,180	29,929	-	-
	感化試驗	24,531	22,734	21,860	-	-
	行為監管	8,799	8,446	8,069	-	-
黑森	小計	17,800	15,440	15,949	16,266	16,375
	感化試驗	16,433	13,624	14,086	14,202	14,202
	行為監管	1,367	1,816	1,863	2,064	2,173
柏林	小計	5,271	3,971	3,538	3,393	3,345
	感化試驗	-	-	-	-	-
	行為監管	-	-	-	-	-
不來梅	小計	2,741	2,350	2,040	1,898	-
	感化試驗	2,649	2,167	1,860	1,706	-
	行為監管	92	183	180	192	-
梅克倫堡	小計	4,817	3,660	3,543	3,222	-
	感化試驗	3,499	2,545	2,453	2,247	-
	行為監管	1,318	1,115	1,090	975	-
薩爾	小計	4,817	3,715			-
	感化試驗	3,499	3,539			-
	行為監管	1,318	176			-

資料來源：Bayerisches Landesamt für Statistik(2017). pp. 12-13; Hessisches Statistisches Landesamt(2020), pp. 11; Statistisches Landesamt Bremen(2019). pp. 212; StatA MV(2019). pp. 289; Saarland Großes entsteht immer im Kleinen(2016). p. 5.

或就個案問題提出指示。故社會服務之人事、預算及實質監督，由邦高等法院（Brandenburgisches Oberlandesgericht）統管，並由院長負責人資管理、機構預算、技術監督及業務評鑑事項。至其執行部門，則設置在科特布斯（Cottbus）、法蘭克福（Frankfurt）、波茨坦（Potsdam）、諾伊魯平（Neuruppin）等4個地方法院轄區，全邦24個區法院共設置20個「感化試驗、司法協助暨犯罪被害補償工作者聯合辦事處」。

至於案量，依聯邦統計局（Statistische Bundesamt; Destatis）統計（Statistisches, 2013: 12），2013年全國感化試驗案量超過18萬件，以北萊茵－西發利亞案件最多（55,868）；巴登符騰堡次之（28,367）。而接近期統計（ADBeV網），2018年全國感化試驗案件仍維持17多萬件，惟未統整各邦資料，爰僅彙整部分公開資料於表4。睽諸巴伐利亞邦從2010年的3萬3千多件，逐年遞減至2017年的2萬9千多件，降幅10.2%。黑森邦從2010年的1萬7千多件，逐年遞減至2019年的1萬6千多件，降幅8.0%。其他如柏林、不來梅、梅克倫堡、薩爾等等，亦逐年遞減。足見整體案量有緩減趨勢，制度似已規律。

## 伍、德國與臺灣相關機制之簡易比較——代結語

過去刑法教育甚少論及冷門的保安

處分，歐陸法系的非機構處遇轉化為司法社會服務之後，猶恐更令人陌生。綜上觀察，德國司法社會服務制度採取法官保留原則，整體操作完全置於法院系統，性質上趨於司法處分；即令少數邦編制在邦政府行政部門（如柏林教育青少年暨家庭管理局），工作內容仍有司法行政之性質。再者，其假釋區分輕罪與重罪（2年以上徒刑之假釋應徵求專家意見），且適用門檻最低2個月，並須取得受刑人同意，特別彰顯當事人在自身刑罰執行的選擇權，頗有注重人性尊嚴的觀感。次在保護管束的概念上，德國將感化試驗、緩刑、假釋、行為監管分別規範，有關期間可以彈性伸縮。在有關行為監管事務，亦可以行政契約方式囑託民間公益機構成為監管機構代為執行；有關措施之實施、變更、縮短或延長期限，雖由法官決意，但係以感化試驗官為意見主體。而感化試驗官之學經歷背景皆係社會工作或社會教育相關科系，專業具有高度同質性，彼等參與專題研究者眾，復以成立工會及社團，形成強大主流意識，得以主導司法社會服務的發展方向。

反觀臺灣現狀，少年與成年社區矯正分設於地方法院（法院組織法§18、少年事件處理法§9）及檢察署（法院組織法§67、保安處分執行法§74.Ⅱ），性質上趨於司法行政或一般行政，所事司法保護業務更是龐雜無章。觀護人在取材的國

家考試，科目與業務脫節，且其資格背景龐雜，難有共識。另在少年領域雖已成立中華民國觀護協會，但對司法改革影響甚微。至於志願服務性質的榮譽觀護人或觀護志工，則因無特定遴聘條件，導致沽名釣譽的商人林立，其群組醉心聯誼活動，迄無專業建樹。其次，臺灣有關假釋審決，採取行政審查，當事人及法官竟然毫無置喙餘地（刑§ 77.I），甚屬可稽。又將假釋、緩刑、保護管束混為一談，緩刑期間、假釋殘刑，皆與保護管束期間相同（刑§ 93），無可伸縮。且無附加命令的設計，執行上欠缺輔導工具及彈性。

管見認為，社區矯正工作者之素質攸關制度之成敗，洵應改良。首先在用人取材階段應即檢討國考資格與科目，尤其應納入刑事政策、各國社區矯正制度等科目，俾使從業者在社會工作專業之外，對司法制度有基礎認識，達到跨領域的素養。次對於志願服務者，應檢討遴聘

規則及相關研習課程，進行資格及培訓內容的調整，以提升專業能力。再者，假釋攸關當事人權益及社會治安，當事人自應為自己爭取權益，釋明得安於社會生活之理由，並由法院審酌社會復歸及社會防衛的平衡，故其流程應改為法官保留原則，糾正現行獄方球員兼裁判的弊端，而有關緩刑、假釋之撤銷，除了回歸司法審查之外，亦可考慮仿照德國法制，全數採擷「相對撤銷」，俾使法官保留原則有效發揮，讓法官有較多的個案裁量空間。另外，德國感化試驗期間兼採定期制及不定期制的設計，除可剔除無益之公帑勞費，亦可促進個案儘速脫離刑事流程自立更生，亦值採參。

（本文作者為桃園地檢署觀護人、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兼任講師）

**關鍵詞：**社會服務、保安處分、保護管束、感化試驗、行為監管

## 參考文獻

北萊茵西發利亞邦司法網。Justizportal Nordrhein Westfalen [https://www.justiz.nrw.de/Gerichte\\_Behoerden/](https://www.justiz.nrw.de/Gerichte_Behoerden/)。2020/4/3作者讀取。

柏林司法網。<https://www.berlin.de/sen/justiz/service/sozialberatung-fuer-mitarbeiter-innen-und-fuehrungskraefte/Flyer-Gerichtshilfe-ARIAL-FINAL-rot>。2020/5/30作者讀取。

科隆社會工作、刑法暨刑事政策協會網站。<https://www.dbh-online.de/>。2020/3/5作者讀取。

黑森邦司法部網站。<https://justizministerium.hessen.de/praevention/bewaehrungshilfe>。2020/4/3作者讀取。

- 德國社會工作專業協會（Deutscher Berufsverband für Soziale Arbeit e.V.）網站。https://www.dbsh.de/profession/berufsbilder。2020/5/7作者讀取。
- 德國感化試驗官協會（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Bewährungshelferinnen und Bewährungshelfer: ADBeV）。https://www.bewahrungshilfe.de/。2020/4/15作者讀取。
- 德國聯邦法律網。https://www.buzer.de/gesetz/6165/b25587.htm。2020/3/30作者讀取。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網站。http://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entscheidungen。2020/5/4作者讀取。
- 聯邦統計局網站。https://www-genesis.destatis.de/genesis/online。2020/4/7作者讀取。
- Barnett, R. (1977). Restitution: A new paradigm of criminal justice. *Ethics*, 87, pp. 279-301.
- Bayerisches Landesamt für Statistik, (2017). Statistische Berichte-Bewährungshilfestatistik in Bayern 2017, S. 12-13.
- Bewährungshilfe für Jugendliche und Heranwachsende, LEBEN OHNE STRAFTATEN, https://www.berlin.de/sen/jugend/jugend/jugendkriminalitaet/2019/9.
- Bewährungshilfestatistik in Bayern, (2018). Bewährungshilfestatistik in Bayern 2017 Unterstellungen am 31. Dezember und beendete Bewährungsaufsichten im Laufe des Jahres. BV17j 2017 Hrsg. im November 2018 Bestellnr. Bayerisches Landesamt für Statistik. Vervielfältigung und Verbreitung, auch auszugsweise, S.12、14.
- Brandenburgischen Oberlandesgericht, (2013). Soziale Dienste der Justiz im Land Brandenburg bei dem Brandenburgischen Oberlandesgericht.
- Farrall, S., Jackson, J. & Gray, E. (2009). *Social Order and the Fear of Crime in Contemporary Times Clarendon Studies in Crimin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 5, 8.
- Fresno Pacific University : FPU網站http://peace.fresno.edu/rjp, Restorative Justice, Restorative Justice Implementation, VORP Resource and Training Center, OCT 2007.
- Hans-Dieter Schwind, Alexander Böhm, Jörg-Martin Jehle, Klaus Laubenthal, (2019). Strafvollzugsgesetze: Bund und Länder.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pp. 180-182, 226-228, 592-594.
- Hessisches Statistisches Landesamt, (2020). Wiesbaden, S. 11.
- Klimke, D., Sack, F. & Schlepper, C. (2013). Wie der punitive turn an den deutschen Grenzen Halt machen soll. In D. Klimke, & A. Legnaro (Hg.), op. cit. S. 103; Michael Lindenberg, Evangelische Hochschule Hamburg, Rauhes Haus. Bewahrungshilfe im punitiven Kontext, op. cit. S. 2.
- Lasse Gundelach, (2015). Die Führungsaufsicht im Jugendstrafe nach der Vollverbüßung einer Jugendstrafe, Nomos Universitätsschriften - Recht, 869, pp. 41-68, 129-213.
- Markus Mayer, (2002). Modellprojekt Elektronische Fußfessel Befunde der Begleitforschung-Zwischenbericht Mai 2002, S. 1.

- Saarland Großes entsteht immer im Kleinen, (2016). Statistische Berichte Statistisches Amt B VI 7 - j 2015  
Ausgegeben im Juli 2016 Bewährungshilfe, S. 5.
- StatA MV, (2019). 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19, S. 289.
- Statistische Bundesamt, (2019). Pressemitteilung Nr. 425 vom 1. S.3.
- Statistische Bundesamt, (2020). Entziehung der Fahrerlaubnis, Fahrverbote: Deutschland, Jahre, Personengruppe.  
<https://www-genesis.destatis.de/genesis/online?sequenz=tabelleErgebnis&selectionname=24311-0003#abreadcrumb>, 2020/5/20.
- Statistisches Landesamt Bremen, (2019). 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19, S. 212.
- Walter Stree, (2014). Jörg Kinzig in Schönke/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StGB Kommentar, 29. StGB § 56f, Rn. 27.
- Wolfgang Klug, Heidi Schaitl. (2012). Soziale Dienste der Justiz: Perspektiven aus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Schriftenreihe der Deutschen Bewährungshilfe, Forum Verlag Godesberg GmbH, Mönchengladbach, Taschenbuch 2, S.20-23.